

重读大师

中国卷

祝勇 主编

辜鸿铭

且说辜鸿铭 单正平

康有为

「圣人」心迹 夏晓虹

蔡元培

昨夜启明之星辰 吴方

章太炎

说「士」 吴方

梁启超

寂寞身后事 夏晓虹

王国维

王国维的忧郁 黄学祥

李叔同

其淡如水 孙郁

鲁迅

《野草》：夜晚的哲学 祝勇

周作人

周作人晚年心态 吴中杰

陈寅恪

最是文人不自由 葛兆光

胡适

毛泽东与胡适 郁之

郭沫若

太阳下的蜡烛 李辉

梁漱溟

关于梁漱溟 孙郁

顾颉刚

痛苦的人格分裂 王学典

吴宓

孤怀卓犖殉道真 唐振常

冯友兰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单纯

茅盾

身后的寂寞 孙郁

朱自清

长长的背影 钱理群

闻一多

激情的归途 许纪霖

梁思成

第十二座雕像 曾昭奋

沈从文

出走与归来 祝勇

胡风

胡风的深刻性和独创性 王富仁

巴金

被遮蔽的巴金 祝勇

吴晗

可怜一觉开封梦 许纪霖

曹禺

永远的雷雨 王蒙

汪曾祺

道不自器 奥之圆方 李陀

王瑶

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 钱理群

山东画报出版社

重 读 大 师

中国卷

祝 勇 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重读大师. 中国卷 / 祝勇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474-0090-6

I. ①重… II. ①祝… III. ①名人—人物研究—中国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6561号

责任编辑 吴 兵 王硕鹏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规 格 148×210毫米

9.125印张 220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祝 勇

《现代汉语词典》对“大师”的释义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简言之，成为大师，有两项条件：有造诣、被尊崇。于是，大师的存在，便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存在。他们的存在，遮蔽着他人与群体，同时也遮蔽着历史。他们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芸芸众生死去，只有他们永生。思想的不朽与伟大愈发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人们确立了大师的话语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当人们试图透过对大师的解读逼近原始的历史，更发现历史已经被他们垄断。大师是山峰也是鸿沟。当我们站立在国家图书馆望不到首尾的书柜旁，我们会感到一种阅读的恐惧，读书越多，恐惧便越深，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思想都被表达过，所有的情感都被倾诉过了。当文学家面对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当哲学家面对庄子和尼采，当经济学家面对马克思和萨缪尔森，他们都可能染上一种疑难杂症——失语。像孔子说的：“予欲无言。”大师的存在足以令后人乱了方寸，就像婆婆怒目之下的小媳妇，不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有的新见都不过是未被揭露的重复，所有的正确都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我们已经失去了偏执一端向这个世界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预先就看到了那种挑战的徒劳与可笑。”我们实在不能断定大师的存在是成全了我们还是妨碍了我们。

朋友说：“纪念碑令我望而生畏。”这确是悖论。大师活水般的思想成为经典，其经典又在时间中风干成僵死的教条。对经典的阅读，

永远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流。在阅读开始之前，阅读者便带有了明显的期待心理和意向性，而这种不平等又往往导致对思想的误读或者原意的遮蔽。然而，我们却大多是这样过来的，在自以为是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大师的改写。与其说是对真理的向往，不如说是对权威的崇拜——大师的名字成为符号，它使我们皈依了传统的拜物教。

也许，“反读”是抵抗投降的好方法。在我的印象中，是友人李书磊最早提出“反读”这个概念。若倒退二三十年，“反读”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假设——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在规定的情境下按照统一的理念解读大师，阅读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于是成为自由体操里面的“规定动作”，我们以为这样可以离大师越来越近，结果却恰恰相反——幸好今天的人们生存在思想开放、价值多元的历史时空里，今昔观念的差别，恰好可以使我们利用叙述立场和阅读立场的冲突，摆脱大师的“催眠”，使自我获得解救。“打倒一切”固然过激，但“怀疑一切”却大有必要。

如前所说，大师的叙述记录了人类的灵魂史，经典则是大师们的精神遗嘱，然而，对大师与经典的阅读效果，除了取决于原作的品质外，更取决于读者的品质。换句话说，大师思想的流动毕竟是相对的，而时代与读者的流动却是绝对的，以绝对看相对，我们感觉不出自身在变，反会觉得大师在“变”，他们在世人心目中所处的位置，除了与其本身的“含金量”有关外，更与阅读者的精神状况有关，即：所谓大师，实际上是经过了阐释的大师——这涉及到接受美学的范畴。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被某一代人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显得尴尬而可笑。这样讲可能极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师的“季节性”变化却在所难免。比如高尔基、索尔仁尼琴、张爱玲等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因而我们说，大师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主观存在”。而后人超越了时代的困囿反观大师时，大师也已不再是个体化的大师，而是杂糅了复

杂的历史信息的文化存在，在时间中经历着升值和贬值的自然过程。

于是便有了“重读大师”这个理念。“重读大师”不仅仅是一种“动态”，更是一种“常态”——这样的“重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就不会是一次性的，而应是时时发生的。我们在重读中领悟了历史的述说，在传统中寻找了“对应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颇富“时间差”效果的重读中，后人不仅“打捞”和发现了已逝的英灵，更能发现自我，体会对既往的生命拥有裁判权的那份愉悦，体会到“现代人对历史的胜利”。

于是也便有了《重读大师》这两本书（中国卷和外国卷）。这两本书的编选，完全出于一种偶然的契机。当最初的动议得到圈子里几位朋友的一致支持后，便义无反顾了。我从一开始就有信心将它编成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所幸的是平日的阅读已经使我具有了“原始积累”，即使是回头重找，也毕竟是心中有数，同时开始以此为专题进行大范围的阅读，以补充视野里的盲点。当下中国优秀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为这两本书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以至于全部书稿完工的时候，心中真是充满喜悦与期待。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本集子谈论的大师，皆为社科人文类，而不涉及自然科学类，且均为近世人物。原因是编者并不打算将其变成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而只想展现近代人类人文精神的演进。尤其对近两个世纪的文化反思，对每个有精神要求的当代人都至关重要。取舍尺度，一在见地，人云亦云者不取，授勋演说者不取，最好说些不流行的话，要个人视角，总之，要凸现“重读”的价值；二在写法，虽不强求行云流水，但一定要不枯涩，文体介于随笔与论文之间为最宜。如此，或可多吸引几位读者。向出版社捧出这两卷厚厚的书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既解说了历史，亦诠释了现在，既完成了对历史的追述，亦完成了对现时的叙述——我们把自身的精神状态，留在了历史的刻度表上。

目 录

辜鸿铭	且说辜鸿铭 单正平/1
康有为	“圣人”心迹 夏晓虹/6
蔡元培	昨夜启明之星辰 吴 方/16
章太炎	说“士” 吴 方/24
梁启超	寂寞身后事 夏晓虹/34
王国维	王国维的忧郁 黄学祥/47
李叔同	其淡如水 孙 郁/53
鲁 迅	《野草》：夜晚的哲学 祝 勇/59
周作人	周作人晚年心态 吴中杰/71
陈寅恪	最是文人不自由 葛兆光/79
胡 适	毛泽东与胡适 郁 之/89
郭沫若	太阳下的蜡烛 李 辉/105
梁漱溟	关于梁漱溟 孙 郁/119
顾颉刚	痛苦的人格分裂 王学典/129
吴 宓	孤怀卓犖殉道真 唐振常/139
冯友兰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单 纯/145
金岳霖	走出阁楼以后 许纪霖/153
茅 盾	身后的寂寞 孙 郁/165
朱自清	长长的背影 钱理群/172
闻一多	激情的归途 许纪霖/181

梁思成	第十二座雕像 曾昭奋/192
沈从文	出走与归来 祝 勇/198
胡 风	胡风的深刻性和独创性 王富仁/217
巴 金	被遮蔽的巴金 祝 勇/222
周 扬	摇荡的秋千 李 辉/227
吴 晗	可怜一觉开封梦 许纪霖/236
曹 禺	永远的雷雨 王 蒙/246
汪曾祺	道不自器 與之圓方 李 陀/253
高 阳	灯火阑珊 舒 禾/266
王 瑶	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 钱理群/275

且说辜鸿铭

◎单正平

第一次知道辜鸿铭，是在八十年代初。读一些回忆录，其中讲他在北大教书时，常在课堂上大骂崇洋的新派人士，说西洋许多东西中国古已有之。给人的印象，是这位老先生经常说一些负气的话，是情绪化的即兴表达。时隔十多年，近读海南出版社新出辜氏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感觉其中大多数说法也是近于情绪化的表达，并非冷静的理性思考。这倒应了辜氏的见解：中国人是主情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趋向，一种如沐天恩的心境。皇帝退位，天恩无法再沐，那平和的心境自然没有，于是就有了诸多并不理智的情绪化的奇异见解。惟其不理智，反倒让人一开眼界，甚或还颇有启发，一如尼采的哲学。

辜氏在一次大战期间向欧洲人发表讲话说：“在欧洲，教士和军警导致了战争，而群氓则将带来革命和混乱，且后者比前者更糟。因此，现在我对欧洲人民的劝告是，不要招回教士，为了善的缘故也不要招进群氓，而只需招进中国人，招进那拥有良民宗教，历二千五百年之久，用不着教士和军警，却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真正的中国人。”

什么是良民宗教？辜氏回答很简单，就是对皇帝的绝对的忠诚。“孔子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国教中宣传并给予了中国人这

个绝对的忠君原则。”至于忠君的中国人如何帮忙管理欧洲、教化欧洲人，辜氏未置一词，我们当然一派茫然。

在《中国妇女》一文中，他说：“中国的理想女性就是一个手拿扫帚打扫和保持房子清洁的妇人。”又说：“我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我们只是认为一个妇人——一位真正的中国妇人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正是妻子的那种无我，她的那种责任感，那种自我牺牲精神，允许男人们可以有侍女或纳妾。”“在我看来，中国的好些纳有群妾的达官贵人们，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纳妾的中国官人或许是自私的，但他至少提供了住房，并承担了他所拥有的妇人维持生计的责任。事实上，如果说中国官员是自私的，那么我将说那些摩托装备的人不仅自私，而且是些懦夫。”“我真怀疑在一千个普通欧美人中，是否有一个能在同一间房里拥有一个以上的女人而不把家变成斗鸡场或地狱的。”一般妇女如此美好，慈禧太后更不得了。辜氏颂扬她“是为世所公认的伟大女性，她具有一切伟人共有的品质——纯朴”。说慈禧伟大也许不错，若说她纯朴，可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他这么颂扬皇太后，并非因一睹天颜、身沐天恩后的感激涕零，他未有此等幸运。他只是从德龄所著《御香缥缈录》一书中发现了太后的纯朴。倘若照此方法，大约姚文元辈也能在“文革”报刊中发现证明江青更纯朴得不得了呢。

辜氏评论欧洲民族，也是出自一种奇怪的印象。他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因此他们都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文明和中国人。只有法国人能理解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法国人虽然没有上述三国人的深沉、博大、纯朴，但却有一种别人所没有的精神特质：灵敏。这个灵敏对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至关重要。辜氏又接着说，上述诸国人，只要认真研究中国，就

能弥补他们天性中的缺陷。这就让人纳闷：既然英、美、德三国人有缺陷而无法理解中国，何以研究中国就可消除其缺陷？我不敢钦服辜老先生的见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人、中国妇女的观点不合事实，对西方人的评论也似是而非，没有让人信服的道理。

我许久以来一直纳闷，像辜鸿铭这种聪明绝顶、留学欧洲逾十年的人，何以能成为如此极端的保皇党，以至于连纳妾蓄辫缠小脚种种陋习都大加赞美？同时代留学者已然不少，但没有任何一人像辜氏那样极端。思忖良久，我想这大约与他从小在马来西亚而不是在国内长大有关。他从欧洲学成归来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北京上流社会的一切，显然所知不多。他对当时社会的了解，更多是在张之洞幕中那些年，像他这样一个抱了认祖归宗的愿望回来的游子，若不被北京伟大的帝王气象征服，反倒不自然了。北京的皇城可能会散发出使人心甘情愿地臣服的魔力。所以他才断定中国人精神中最可宝贵的是忠君。而同样的意思，在鲁迅那里被界定为奴性。看来奴性也好，忠君也好，其为普遍心理，大概是不错的。二十年代，冯玉祥带兵进京把溥仪从宫中撵走，胡适对此表示异议。逊清王室或溥仪本人曾对胡适表示过嘉许或感谢，胡适闻知即有受宠若惊之感。虽说这见于传闻的事未见得可靠，但那种“感觉”的真实当无可怀疑。胡适是最典型也最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十年对国民政府蒋介石本人多有指责抨击毫不畏缩，但对倒塌王朝逊位皇帝却那么在意，可证忠君或奴性在中国是一普遍情结，很不容易消解，即使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我们这一代人倘生在一个世纪以前，或半个世纪前，那奴性或忠君情结也许当比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二十年前的心路历程足可证明我们普遍有此“美德”。

而像辜鸿铭那样顽固忠君到大义凛然的境界，却也是当今人望尘莫及的。当年蔡元培先生容忍大骂辛亥革命的辜氏在北大教书，即有人极表反对，而蔡先生不予理会。他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也到了大义凛然

的境界。

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如果当年审判“四人帮”后，让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指定大学里开设政治宣传学、望文生义学、文字狱史、阶级斗争批评学诸课程，让江青讲样板戏、讲“三突出”创作原则，那会有怎样的效果？把这几个宝贝的才华给埋没在监狱里，是有些可惜了。依张东荪先生所发挥的思想自由原则（思想倘使不与行为直接相连则任何危险思想都不含毒素）论之，则“四人帮”在讲台上放毒，当不会导致“文革”复辟。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中只有一个蔡元培，张东荪也为数极少，一般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都习惯于不让别人讲话（“文革”中的口号是只许老老实实在，不许乱说乱动），更何况当权者。“文革”后许多受害知识分子对播放样板戏有过敏过激反应，正说明他们太过情绪化，缺乏容忍“言论自由”的胸怀。他们可能忘了或者不理解蔡元培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却又允许保皇党的辜鸿铭大放厥词。现在知识界又有人高喊不宽容，作为个人态度固然无可厚非，但在社会舆论层面上，不宽容的潜在含义就是独裁，虽然言者也反对独裁。

这纯属操心。我们再回到辜鸿铭。假若天才的辜鸿铭生于国内，长于国内，然后留学，然后回国，我想也许他比胡适更激进也未可知。又假若他当年有幸蒙慈禧重用，委以批判西方文化及国内数典忘祖之激进派、革命党的重任，那他的笔头肯定比张春桥、姚文元厉害得多。可庆幸的是他没领受圣命，他只是个人言论而未转化成政治行动，否则，以辜老先生的愤慨与坚决，若真像他希望的那样总理国政，那掉头的就不只是六君子了。辜鸿铭曾向来访的英国文豪毛姆表示，他“有总理国政的才能，可是没有皇帝可以把重权信托他”。我们真该替陈独秀、胡适、鲁迅们庆幸。

我相信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不同，同一人的见解会截然不同。许多情况下，人对亲眼所见的东西反倒认识不清，所谓熟视无睹。辜鸿铭

游学欧洲，后半生在中国，他对欧洲及中国的认识不客气讲大都是模棱两可的偏颇之见。他未去美国，反倒对美国人的看法较接近实际，这真是让人惊奇的事。他在《美国人的心态》一文中说，美国人“是一帮孩子——一帮伟大的早熟的孩子。当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仅仅是些物质世界的简单的实体或东西时，如同伐树、屠宰、烧炒贝壳之类时，他们的智力还能够信任；可当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非物质世界的错综复杂的事情时，比如像教育、宗教、文明和国际法等事情时，那么美国人的这点起码的、本来有用的常识，就变成了应抛弃的、简单的、直观的和非常危险的无知和扯淡了。事实上，我想在此指出，何以美国人尽管综合了全世界各民族的睿智，而在与各种各样的骗子打交道时却要轻易地上当呢？其原因在于，普通美国人的智慧、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智慧只不过是起码的常识，是聪明的动物的智慧而已。……如果人们能够记住美国人是一帮孩子。……那么，人们就能马上理解，美国宗教社会与机构的单纯，美国内部政策的喧嚣、无聊和欺骗性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笨拙、愚蠢和不可靠了”。虽然这有点老爷爷观察小孙子的味道，大人不记小人过，日子长着呢，你们慢慢地长吧等等天朝心态，但大体上还是不错的。证以今日美国国内的现状及国际上的所作所为，足见辜老先生确有过人的敏锐与深刻。

康有为

“圣人”心迹

◎夏晓虹

康有为大约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且最有争议的人物了。第一个为其作传的弟子梁启超恭维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①而康氏未去世前，却已有“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联语盛传一时，既嵌入“有为”之名，又运用歇后语的方式，取《礼记·中庸》及《论语·宪问》中句，而分别隐去“妖孽”与“贼”，毒骂康有为是“国家将亡必有”的不祥之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精。此种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集中于康氏一身，无疑与其性格及经历的传奇色彩大有干系。

平心而论，康有为一生应是功大于过，故“妖孽”之说不免意气用事。而生当内忧外患夹击、王朝摇摇欲坠的清末，国家将亡的时势倒确能酿造出震动一世的奇人。其号“长素”，虽自解为“思人无方，行必素位，生平最受用素位之义，故以长素自号”^②，但世人偏偏只信“长于素王”的谣传，谓其有以“素王”孔子自居之意。而康氏的言行，确也有利于助成此说。因少年时代即“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

①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一章。

② 陆乃翔等：《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三章。

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①，这一出自弟子之笔的郑重记述，已显示康有为志向远大，所期许之事业亦不在孔子下。康氏自撰年谱，于十九岁之年亦明道：“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②因此，“康圣人”的绰号轰传人口，其中虽不无取笑的意味，在康氏本人，则未尝不私心窃喜。

“圣人”之行事自然非同寻常。康有为在求学时期的狂傲不逊，尚可以才高识精的常人之情推理之；而其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悟道方法，便显得怪异而不可理喻，难怪“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似乎已离疯人不远。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同有“疯子”之称的章太炎，不被理解几乎是所有“造时势之英雄”的“先时人物”（梁启超语）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正是在这种几近疯狂的玄想方式中，康氏才发见了成为其日后终身信奉不变的思想体系。这些精神的漫游，又都与“圣人”的思绪相沟通。在礼山草堂的初次“绝学捐书”、“静坐养心”，令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次年入西樵山，居白云洞，“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经过此番涤心荡腑，再加以西学的接引，自觉尽采中外之精华的康有为，于是豁然贯通，“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长短之度，有定无定之理，形魂现示之变，安身立命，六通四辟，浩然有得”，因而了悟大同世界终必可至，现下则时时刻刻以救世为己任。^③

若论救世，康有为可谓躬逢其时。胡思敬称康获闻德占胶州湾后，

①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二章。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③ 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拊掌喜曰：‘外祸亟，吾策行矣。’”^①对国难幸灾乐祸，固然是政敌一方的拟揣、诬指之辞，不足信。而康之出名，确以外患日深为契机，倒也不必讳言。但康氏又并非只是风云际会、趁时而起，作为“先时人物”，他还有见微知著、首开风气的胆识。其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廷，虽貌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以关外祖陵崩塌为由，吁请光绪皇帝下诏及时变法，而其实不过是数年来潜心研习所得，一旦而发之。以一名未曾中举的诸生而欲直接奏陈皇帝，又为朝野厌恶的西学鼓吹、张目，其不得达本在意料中，但康氏之为大勇者的品格亦得以显露。“冒死上书”并不是康有为事后的过分渲染，即使是庸人、守旧者口中的“危言耸听”，也还需要胆力方可说出。所谓“甲午款夷后，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严，屡兴大狱，无敢轻掉笔墨讥时政者”^②——出自胡思敬笔端的记述已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幸好光绪不是昏君，嗣后见康有为第五书中“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也”诸语，心中明白，故不加罪，反大感动，许以“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③。于是，康氏施展其平生所学的政治机遇终究来临。

“百日维新”实乃康有为一生最风光的时期。拟奏折，上条陈，备顾问，康有为忙得不亦乐乎；黜旧党，用新人，颁政令，光绪皇帝的砝码也明显移向康氏一边。此时，光绪的命运已与新政融为一体。到头来，为报答“英主”的知遇之恩，也为挽救即将被扼杀的变法事业，康有为又谋划借袁世凯的新军“兵谏逼宫”，迫慈禧完全放弃控制朝政的权力。这虽是一着险棋，却不失为绝处求生的唯一方策。既是宫中密谋，知情者自是越少越好。事后，由于各种因素的牵扰，或夸大其辞，或有意隐瞒，来自政变一方的可能是诬陷，出于流亡一方

①② 《戊戌履霜录·康有为构乱始末》。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向用始末》。

的可能有别情，使得这一流产的“前政变”成为聚讼纷纭的公案。张伯桢的《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的《康有为向用始末》、胡思敬的《康有为构乱始末》、王照的《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基于各人立场之不同——张、梁为康氏弟子，梁、胡二文则从题目上即构成对立，王氏属于维新派中的与康不合者——诸文不仅自多种角度记录了“戊戌新政”的全过程，而且对密诏及兵谏作了不尽一致的陈述。揣摩其间的缝隙，探究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的，应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

既然有“素王”之称的孔圣人曾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康有为之企望作王者师、登宰相位，也应该算是亦步亦趋、心迹相同。只是，孔子尽管可封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诸多头衔，而历代皇帝所承认的“大成至圣先师”名号，毕竟最为人知晓，无独有偶，康有为虽然因倡导变法、力行维新的政治施为而名垂青史，其弟子们却异口同声地礼赞其为大教育家。自梁启超首发“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①之论，继而“通力合作”撰写《南海先生传》上编的康门众弟子也沿袭此说，而谓之“先生之为何人物不可定，若其教育之成效已昭昭矣”^②。万木草堂当然不是中国最早一所新式学堂，也比不上宋明讲学家的门人成百上千，然而，其间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过早去世的陈千秋、曹泰不必说，长期追随康有为的门生中，梁启超可算是最知名者，余外如徐勤、麦孟华、欧榘甲、韩文举、罗普、潘博、陈焕章等，也均为近代社会的活跃人物。虽不能完全排除因缘时会的成分，“名师高徒”总有其久经验证的道理。

康有为自行创立的草堂学风，诚属新旧杂糅。论授课内容，则“以

①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五章。

② 同上书，第十章。